

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  
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

# 引 言

## 1 背景与意义

20 世纪中国发生了深刻的人口转变。自 1970 年代初期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从双第一转变为人口总量第一、人口增长第二。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红利”行将枯竭(蔡昉等,2004,201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巨大经济体的增长奇迹,从一度濒于崩溃边缘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达到 4000 美元,并已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sup>①</sup> 这种奇迹能否延续? 如何延续?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人口过快增长曾经为国民经济带来许多困难,人口增长的下降也带来了国民福利的显著增加。这是否意味着人口增长下降的延续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个福音?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去靠什么?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未来有无变化? 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怎样的人口环境? 经历了 30 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面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迅速转变,现行生育

---

<sup>①</sup>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按购买力评价估算,2003 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 15.1%,居欧盟和美国之后;人均 GDP 为 4800 美元。参见《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36 页。

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引起了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要保持现行政策不变,甚至主张实行更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把未来人口总量控制在10亿以内(李小平,2007;程恩富,2009)。但调整生育政策为更多学者和社会人士所拥戴。在2007年和2008年两会期间,叶廷芳等29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纪宝成、吴建民等关于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观点,易富贤《大国空巢》中的内容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sup>①</sup>中国人口政策向何处去?随着人口转变的推演,人口红利如何变化,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由此使得,研究人口转变、人口控制政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外部需求动荡。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风险增加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立足点。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一揽子措施,遏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那么,内需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人口因素及其变化蕴涵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人口政策的走向、人口转变的推演,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已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内需,但内需不足,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对转变发展方式的瓶颈制约更加明显。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实现改革与发展的新的突破。

---

<sup>①</sup> 参见纪宝成、吴建民、李成贵等在两会上的发言和提案;其他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讨论可参见易富贤撰写的《大国空巢》一书,大风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1954)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二元结构”理论以后,劳动力无限供给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经典的、几乎不受质疑的假定,然而这个假定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在 2004 年以后出现了“用工荒”,而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与之并现的是,大学生就业也由上世纪的抢手变为近年来的烫手,“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交叠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风景。

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本书对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极具前瞻性和现实意义。对寻找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可能路径和持久动力,对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政策意义和应用价值。同时,基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人口转变,分析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理论和人口经济理论的创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 关于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研究

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这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我国学者对人口控制政策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吴忠观、肖立现,1994;杨魁孚,2000;王金营,2006)。但面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迅速转变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引起了人口学家(冯立天等,1999;乔晓春,1999;张纯元,2000;李建新、李小平,2002;梁中堂,2003,2005;叶文振,

2002; 邬沧萍, 2005; 翟振武, 2005; 蒋正华, 2006; 桂世勋, 2005; 曾毅, 2005, 2006; 田雪原, 2009) 和经济学家(林毅夫, 2004, 2006; 郭熙保, 2005; 胡鞍钢, 2005, 2009; 姚洋, 2008) 的关注和热烈讨论。面对 21 世纪的人口发展, 有的研究对中国生育政策演变轨迹进行回顾以期悟出未来走势; 有的研究通过国外经验的借鉴, 以中国人口转变为背景, 结合劳动力市场、储蓄、消费和其他社会经济效应的分析, 引申出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必要(蔡昉、王德文, 2004; 李通屏, 2006), 有的研究通过对 1990 年以来生育水平的评估或未来人口发展方案的比较(郭志刚, 2004; 王金营, 2004; 张广宇、原新, 2004), 直接或委婉地提出需要调整现行政策。2006 年年末, 由 10 多位两院院士、300 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发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 继续主张稳定现行政策。几乎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再次强调稳定现行政策。但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没有停止: 2007 年两会期间, 叶廷芳等 29 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呼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 回归“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轨道上来;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引起轰动。2009 年 12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在《人民日报》<sup>①</sup>撰文指出, 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 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其一, 全国不分城乡, 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其二,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 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 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农村可以现在开始实施, 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 其三, 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 农村可不分

---

<sup>①</sup> 田雪原: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人民日报》2009 年 12 月 4 日。

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观点认为,现行生育政策是几经调整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政策,有利于实现将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8 左右的目标,“十一五”时期应保持稳定,同时要积极开展生育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2007)。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指出,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21 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重高峰。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 800 万至 1000 万人。“十一五”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时期,综合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控制目标,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环境)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五亿人左右)以前,计划生育还应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应尽快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新政,积极倡导“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1994 年,美国学者布朗(L.Brown)主张中国应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耕地减少将造成严重的粮荒,到 21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不仅不能养活自己,而且会造成世界的饥饿。盖尔·约翰逊(D.G.Johnson,2000)认为,从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和经济财富是一同增长的,马尔萨斯的模式并没有成功,应该允许较慢的人口增长。邹至庄(Gregory C.Chou,2000)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人口政策进行了评估,他指出,主张计划生育政策

的观点可能不很受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作用可能非常严重,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将来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首先来源于人口,经济增长取决于注入经济的新知识,而更多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新知识被创造出来。

总的说来,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调整人口政策的必要,但并没有拿出说服力很强的证据,更没有对政府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主张继续实行严格人口控制政策的建议,由于忽视我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不断遭到抨击。加强生育政策的深入研究,提出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说服力极强的调整方案,非常紧迫、非常必要。

## (2) 为什么要调整人口控制政策?

### 1. 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出生性别比升高

林毅夫(2006)认为,应该肯定 1970 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但是中国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为了避免在收入水平不高的阶段过度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应该考虑放松现有的“一胎化”政策。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赶超战略,经济发展越来越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人均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高非常快。从经济理论和东亚经验来判断,即使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也不至于出现大幅度反弹。改进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sup>①</sup> 郭熙保等(2005)认为,中国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取

---

<sup>①</sup> 林毅夫:“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载《21 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 页。

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和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等。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sup>①</sup> 桂世勋(2005)认为,最好从2016年开始调整上海户籍居民的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个:有利于未来户籍出生人口数的“削峰填谷”、有利于避开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有利于做好未来独生子女父母的生活照顾。<sup>②</sup> 蔡昉(2005)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角度讲,应该对生育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sup>③</sup>

## 2. 现行政策与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差距太大

梁中堂(2006)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同广大农民生育意愿的差距过大,在长期执行过程中给农民造成的伤害巨大。所以,迅速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彻底纠正“一胎化”给社会稳定造成的隐患,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sup>④</sup>

## 3. 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是非常态的政策,实施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

左学金等认为,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政策,非常态的政策需要非常态的理由支持,如果没有非常的理由,就要向常态回归。“十一五”期间应逐步放开生二胎,这样可以避免人为加剧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进程,还可以减少政府政策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冲突,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

---

① 郭熙保、尹娟:“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

② 桂世勋:“中国现行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社会观察》2005年第5期。

③ 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未雨绸缪”,《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

④ 梁中堂:“现行生育政策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5期。

本,这种改进后的政策具有“帕累托改良”性质。<sup>①</sup> 张翼认为,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sup>②</sup> 王丰(2000)、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 2006)认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人口因素是一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但一孩政策并非是正确的导向,在一孩政策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在快速下降。第一个红利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归功于一孩政策本身。由于部分父母被迫只能生一个孩子,我们很难说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否超出了父母为一孩政策所付出的直接代价。同时,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也造成了生育率数据搜集系统的崩溃以及性别比与年轻女性超额死亡率快速增长。<sup>③</sup>

#### 4. 尊重人口规律,应对复杂多变的人口形势

郭志刚等(2006)对人口的预测分析表明,不能等到人口零增长时再来考虑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能指望现行生育政策内涵的开放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的照顾可以自然而然过渡到普遍开放二孩生育的状态。那样便会贻误战机,导致人口控制矫枉过正。<sup>④</sup> 顾宝昌通过中国、印度与韩国人口趋势的比较分析,指出,中国正在逐渐偏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基本特征和正常变化趋势,而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现象。面对变化多端的人口形势,

---

① 左学金、杨晓萍:“中国人口转变的长期经济影响”,载《21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张翼:“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③ 王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载《21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解振明:“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与未来人口展望”,同上书。

对人口变化趋势的认识和对人口规律的把握日益紧迫。要认识到人口变化的连贯性,还要考虑这种变化在今天的影响以及在将来可能导致的后果;要注意各个方面的关联性,人口在一方面的变化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叶廷芳教授呼吁,不应以沉重的“软代价”换取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为了亿万青少年精神人格的健全,为了民族精神生态的安全健康,应尊重自然设定的警戒线,有计划地放开二胎势在必行。曾毅(2006)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即经过几年的平稳过渡后,在2012—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育二孩的软着陆。而如果等10年、15年再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儿在2025年后相当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比例迅速增加的老年人口及资源萎缩的劳动人口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另外,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将导致出生人数适当增加,显著拉动内需,扩大就业。<sup>①</sup>

#### 5.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人口控制政策需要与时俱进

都阳(2006)认为,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要求我们考虑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分母效应”不能再成为制定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sup>②</sup>李通屏等(2007)认为,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肇端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中国经济正在向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迈进,而且经过长期计划生育的洗礼,应当相信民众理性决策的能力,对生育主体的理性生育和生育理性要但能容忍且容忍,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应适时淡出。<sup>③</sup>胡鞍钢

---

① 曾毅:“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载《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都阳:“生育率、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同上书。

③ 李通屏、郭继远:“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演变”,《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1期。

(2006,2009)认为,一味地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的数量压力已经减轻了,而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sup>①</sup>,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没有超过 10 年的公共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应适时调整。我们现在“二胎”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姚洋(2010)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它们的人口比较年轻的时候,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继续鼓励完全自愿的只生一胎政策,既扩大了两胎的范围,同时也鼓励城乡以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居民之间的融合。<sup>②</sup>

### (3) 增长秘密、增长源泉与可持续性

探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迷人的领域,但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存在不同看法。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学家普遍强调聚集资本对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了不满于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从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一类投入要素到 60 年代强调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影响,认为只有保证不断增多的存量资本才会有不断上升的资本生产率,强调必须具备较好的技能,“发展的软件”能保证

---

<sup>①</sup> 胡鞍钢:“中国人类发展趋势与长远目标”,载《21 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经济参考报》2009 年 11 月 26 日。

<sup>②</sup> 关于叶廷芳、姚洋教授的主张可参见曾毅、顾宝昌、郭志刚等:《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1—178 页。

“硬件”(劳动力、资本)变得更有效率。到了70年代,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被关注,结构变化因素也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八九十年代,企业、知识和制度受到进一步重视(柯武刚、史漫飞,2000)。尽管这些成果反映了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这些理论成果主要从总供给增长的角度关注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把储蓄、投资和资本形成看做增长的福音,把生产能力的积累看成决定经济增长路径的主要因素。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并把资本概念从物拓展到人,虽然被认为找到了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答案,但仍没有摆脱供给的窠臼。实际上,20世纪50—70年代以后,现代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对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范式批评的焦点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是否由生产能力决定。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描述了市场经济由需求决定产出的过程后,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确实是由需求决定的,但长期增长仍由“生产能力”决定。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78)清楚地指出生产能力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与统计数据是极不相符的(张楷弛、柳欣,2007)。马德里克(J.Madrack,2002)在坚持经济增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的基础上,强调最接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是市场规模和信息传播,特别是国内市场膨胀所导致的市场成长。伊斯特里(W.Easterly,2002)尖锐地批评了一系列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诸如援助、增加投资、教育、“避孕套工程”、减免外债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指出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赫尔普曼(E.Helpman,2004)试图回答为什么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

增长绩效会差异巨大,指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之外,强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即知识跨国流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内生人口增长等因素对持续的的增长的重要性。诺斯(D.C. North,2005)把经济变迁看做人口、知识存量和制度各种变化因素的结果,强调完整的经济变迁理论需要整合人口学、知识存量和制度变迁的理论。

#### (4) 人口、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暗含前提是人口影响经济而人口本身又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人口政策影响经济的机制比较复杂,可图示如下:

图 0.1 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 1. 生育政策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机制

生育受多种因素影响。最著名的有邦戈茨(John Bongaarts, 1978)模型和伊斯特林(R.A.Easterlin, 1985)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邦戈茨认为社会经济因素是生育率的最终决定变量,但其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生育率的直接决定因素是生物学和行为因素。邦戈茨选取了四个最重要的直接决定因素:结婚、避孕、人工流产和产后不孕概率作为生育率的抑制变量,这些变量的作用使得妇女实际生育率低于其理论值。

他给出的生育率决定公式是:

$$\begin{aligned} \text{总和生育率} = & \text{结婚指数} \times \text{避孕指数} \times \text{人工流产指数} \\ & \times \text{产后不孕指数} \times \text{总和生殖率水平} \end{aligned}$$

邦戈茨模型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中间变量影响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机制。

伊斯特林分析了孩子的需求、供给、调节生育的成本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育率的综合分析框架(如图 0.2)。

图 0.2 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

伊斯特林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认为,影响生育行为的有三个核心变量:孩子的需求、孩子的供给和调节生育的成本。孩子的需求是当生育控制成本几乎为零时父母想要的存活子女数;孩子的供给是指在不存在故意限制家庭规模的情况下,一对夫妇会有的存活子女数;生育控制成本是指节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伊斯特林认为,孩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较决定生育控制动机;当孩子的供给小于对孩子的需求时,不存在生育控制动机;只有在孩子的供给大于需求时,才产生不想生育多余孩子的要求。两者间差额越大,生育控制动机强度越大。但动机仅仅是生育控制的必要条件,能否实现生育控制还要受生育控制成本高低的制约。即使在孩子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生育控制成本过高,高于生育控制动机,生育控制动机仍难于实现,人们的生育会接近于潜在自然生育率。生育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是社会现代化,它通过三个核心变量作用于与人口再生产有关的直接决定因素,从而决定现实的生育状况。

另外,根据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行为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生育行为可理解为生育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这里环境包含的内容比较复杂,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因素

的影响更直接、广泛,内容更丰富,如社会群体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科技环境和文化环境因素,显然,生育政策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按照上述模型,生育政策通过影响孩子的供给、需求、生育控制成本以及结婚、避孕、引流产、产后不孕时间的长短进而影响最终的生育水平。因此说,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的生育率之间存在差距是必然的,现行生育政策并非现实人口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王金营(2006)的研究表明,1972—2000年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sup>①</sup>至于提高生育率,20世纪后半叶以来,鼓励生育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遭到了挫折,从苏联到现在的独联体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并没有太多作为。日本等东亚、东南亚国家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很快取得了成功,但后来旨在提高生育率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明显效果。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对鼓励生育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正作用及其作用程度给予量化。但学界普遍认同的是,生育政策并不能为所欲为,生育率不像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

## 2. 人口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个有争议性的论题。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凯恩斯主义刺激有效需求的乐观论以及索维的适度人口论。马尔萨斯(T.R.Malthus)看到了物质资料不足时人口增长的消极效应,凯恩斯对他十分敬仰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警告世人,在萧条时期,

---

<sup>①</sup> 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5期。

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可能是一个大灾难。汉森(A.H.Hasen)、斯维齐(P.Sweezy)注意到经济危机频发时期,人口增长对克服危机的积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的观点大致归纳如下:

A.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悲观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关“人口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上。来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低努力假说”、纳克斯(Nurks)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科尔和胡佛(A.J.Coale and E. Hoover)对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赫茨勒(J. O. Hertzler)的“人口压力论”、福格特(Vogt)的“资源耗竭论”、米多斯(L. Medows)的“增长极限论”等,都把人口增长看做经济持续增长的阻碍力量。

B.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人口问题的转型,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严重负作用的悲观论有所修正。库兹涅茨(S.Kuznets,1966,1974)认为,人口增长是与稳定的或相对提高的人均产品一同实现的。在其他参变量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人口增长或不增长对人均收入造成的可计算出来的差别可能很小。克拉克(Colin Clark)指出,从一个长时期来看,一个增长的人口可能比一个非增长的人口更能导致经济发展。伊斯特林指出,人口压力可能对人们的动机产生有利影响,导致生产技术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可以克服人口压力造成的不利后果。年轻型人口结构能使一个国家对变化有较高的承受力,对新思想有较强的接受力,更乐意把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博塞罗普(E.Boserup)认为,人口对食物供给的压力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刺激源。西蒙(J.L.Simon,1977)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历史并不支持马尔萨斯的简单模式。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

将产生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它通过储蓄、劳动供给、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表现出来;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个人和社会的转化,如工时增加和生产技术的转变等。诺斯认为,“人口增长是古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基本要素”;人口压力是一柄两刃的剑。它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即“导致社会革新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来促进生产力提高到持续经济增长时期”。舒尔茨(T.W.Schultz, 1981)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口稠密的西北欧及亚洲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或地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尽管资源匮乏,但在经济发展方面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由9位著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课题组,推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的报告。报告认为:人口增长及规模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人口与发展的联系既直接又间接;人口的作用有时会加重那些基础性问题,并使其症状迅速表现出来。总的说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较慢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利。凯利(A. C. Kelly, 1988)认为,尽管许多国家人口的影响可能微不足道,但在人口增长放慢的条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人均产量测度)将会更快。

C. 人口增长衰减或人口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凯恩斯、汉森、雷德韦(Reddy)在20世纪30、40年代已做了许多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已进入或接近人口零增长阶段,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与日俱增。1978年,托马斯·J.伊斯蓬沙德和威廉·J.西罗(T.J. Espenshade and W.J. Serow)编著的《人口增长下降的经济后果》